

夜战洪元里大获全胜

我出生于1935年11月,14岁那年父母双双离世,投靠舅舅家。1950年土改时,我分到两块田、一间屋,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1952年7月,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不久,我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,在朝鲜阳德下车后,开始了连续十几个夜晚的行军。那时的朝鲜冰天雪地,到处都白茫茫一片。有一次翻越一座大山,走到半夜找不到下山的路,两边都是万丈深渊,十分危险。我们当即停下,双手紧抱枪支、裹紧棉衣,挤在一起休息,等天亮再赶路。可第二天点名时,还是发现少了几个人,后来

才知道,他们不小心滑落到山下,被活活冻死了。

到达目的地后,我被分配到23军69师207团3营11连。我们营驻守在铁原与平康接合部的夏回山阵地,东面就是上甘岭,山下有一条直通平壤的公路,山后则一马平川、无险可守,而南面的洪元里高地,正是美军的盘踞之地。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牢牢守住夏回山,绝不能让美军突破防线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洪元里高地战斗前的场景:大家都提前写好自己的姓名、血型 and 家里的地址,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战斗发起的那天晚上,为了方便识别战友,我们在腿上绑了一块白

布。在军部远程炮火的支援下,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向敌军阵地发起猛攻。敌军阵地外围布满铁丝网,还挖了深沟,碉堡呈三角形配置,火力交叉封锁,防御十分严密。好在大炮为我们开辟了道路,摧毁了前进路上的障碍物,我们步兵随即猛打猛冲,冲入敌军阵地后,用机枪扫射、手榴弹轰炸,一口气消灭了100多名敌军。在美军援兵赶到之前,我们迅速撤出战斗,并彻底炸毁了敌军的碉堡和防御设施。这场战斗我们大获全胜。

班长邱汉民是广西人,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实战经验特别丰富。他总耐心教我们如何

利用地形地物保存自己、杀伤敌人,还教我用机枪打敌机。有一次,我们在山上警戒,他把机枪架在我的肩膀上,等敌机向下俯冲的瞬间,他猛地扣动扳机,子弹打在飞机翅膀上直冒火星,那架敌机吓得立刻掉头逃走了。

1953年7月27日晚上10时整,敌我双方的阵地上突然都停火了,四周静得可怕,一点都听不到枪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。直到第二天,我们才得知停战的消息,胜利真的来了!大家高兴得蹦蹦跳跳,阵地上到处都是欢呼声。那种激动的心情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(口述/江苏常州 黄其生 整理/谢丽娟)

到学生家吃派饭

上世纪80年代初,一些乡村学校还没有食堂,老师们轮流去学生家里吃派饭。我初到一所村小任教时,也入乡随俗,走进了一户户学生的家门。

每次放学,我循着学生指引,缓步走向他家。学生家长满面笑意地迎了出来,搓着手连声招呼:“老师来啦,快屋里坐!”一进堂屋,方桌早已摆得整整齐齐——白瓷盘里盛着家常菜。吃饭时,家长不住地往我碗里夹菜,嘴里念叨着:“都是自家种的,您别客气。”

我捧着温热的饭碗,听着家长亲热的话语,只觉得饭香混着人情味,在小小的堂屋里弥漫开来。没有山珍海味,不过是寻常的农家滋味,却吃得人心里暖洋洋的。那时的派饭,吃的从来不是一顿简单的饭菜,而是乡亲们最真挚的心意,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朴又暖心的烟火气。(江苏盐城 陈建春 63岁)

双手摸师傅后背

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,在单位里年龄最小。我那时候不爱说话,明明心里什么也没想,可师傅们总说:“不说话的人呐,就是心眼儿多。”为此,我觉得特别冤。

我常听师傅们互相开玩笑:“这天不知道下雨不下雨?摸摸你的后背潮不潮就知道了。”我只看他们笑,却从来没想到过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一天,师傅们又开起了玩笑,依旧是拿下不下雨说事。我想,师傅们都怪我不说话,那我就锻炼怎么与人交流吧。我倒是不怕自己师傅,尽管大家都有点怵他。我双手摸着师傅的后背说:“看看我师傅这后背潮不潮?”

我这句话刚说出口,就看到师傅连脖子都红了。其他师傅们也大都大眼瞪小眼,不再吱声了。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,愣在那里不出声,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应该会被师傅狠狠责备一顿吧。结果,师傅很大度,既没说话也没发火。后来,我弄明白那是骂人的话,才知道自己当时出了多么大的丑!(河北唐山 张琪 72岁)



在青年点过春节

我1975年初中毕业,到辽中县城郊公社插队。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家,我很想家,盼着快点过春节好回家。在春节前,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家了。这时,上级提倡: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,春节不回城。我想,自己刚刚被选为青年点副点长,应该起带头作用。尽管很想家,但我还是决定不回去了。

青年点带队干部是我父亲单位的王阿姨。她也不回沈阳过春节,正好,我俩是个伴。大家都走了,我们开始打扫青年点的卫生,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。我们还去队里五保户



刘学博1976年留影

家看望,帮他们打扫卫生、贴对联。然后,我们就坐下来写次年的计划:开春种地,改善青年点伙食,多种几样菜……在忙碌中,十多天很快就过去了。过完春节,我的同学和老知青们陆续回到青年点。那几天没什么事,几个女知

青说:“去县城吧,拍几张照片,留作纪念,献给将来的回忆。”大家一致响应,于是,我们去了县城。

那是1976年3月11日,天气很好。我们正是十七八岁的年龄,都很爱美,进了照相馆,大家互相打扮。我穿的毛衣是二姐给织的,平时干活都舍不得穿。忘了是谁把白色纱巾借给我,不是系在脖子上,而是系在头顶。照相时,大家七嘴八舌地说:“写几个字吧,写什么呢?”最后,“青春”两个字留在了我的照片上。(口述/辽宁沈阳 刘学博 整理/刘利华)

种棉花买自行车

1978年我上高中时,家里仍买不起自行车。当时,谁家有一辆自行车,不亚于现在拥有小汽车。1979年冬天,高中同学秦新镇用自行车带我回家,我上车时,一不小心,车条“咬”坏了我的鞋后跟。从那时起,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买一辆自行车。

实行土地承包后,我家分得了十多亩地。“要发家,种棉花。”1982年,我们家种了7亩棉花,卖了一大把票子。那年初冬,表哥帮忙搞到一张自行车票,我们花了146元钱,终于买了一辆“泰山”牌加重自行车。我和弟弟轮流学骑车,哥哥在后货架上横着绑一个棍儿,这样,车歪了也摔不着我们。三天时间,我们两个都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上街赶集,晚上去看电影,骑着自行车,真爽啊!(山东菏泽 王林胜 62岁)

第一次照相,穿着补丁衣服

1969年3月,我12岁,在吉林省榆树县保寿公社街里住。姨家表姐来我家,大姐提议,姐几个去照张相。当时,保寿只有一家私人照相馆,设在乡下。我们家姐弟5个,加上表姐,6个人走了五六里路,才来到照相馆门前。

照相馆非常简陋,我们脱掉旧棉衣,穿上单衣,感觉特别寒冷,妹妹冻得缩着脖子。在一块幔布前,我们照了一张相。这张黑白照片上,有4个姐姐、我和妹妹。妹妹的衣



朱乃波(前排中)姐弟合影

服是借的。我戴着帽子,穿着一件旧蓝布衣服,左肩膀上有一块明显的深色补丁——这是我当时最好的一件衣服。

这是我第一次照相。后来,每次凝视这张照片,我总会回想起那个艰苦的年代。那时,我们全家7口

人,父亲在小学工作,母亲身体不好,我和三个姐姐都上学,家里靠父亲几十元的工资维持生活。租房住,吃菜烧柴都得买,生活十分困难。我们上学的书包都是用旧布缝的,练习本两面写字。由于没钱买柴,有时间,我们姐弟就拿镰刀和绳子去四五里地远的一片草甸子打柴火。冬天,我和三姐每天都要起大早,拎着小筐,到外面捡煤核,小手冻得又红又肿……(吉林长春 朱乃波 68岁)